

查清华 著

明代唐诗接受史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明代唐诗接受史

MINGDAI TANGSHI JIESHOUSHI

ISBN 7-5325-4501-6



9 787532 545018 >

定价: 35.00元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明代唐诗接受史

查清华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代唐诗接受史/查清华著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6. 7
ISBN 7-5325-4501-6

I. 明... II. 查... III. 唐诗—接受美学—文学批评史—研究—中国—明代 IV. I207. 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81801 号

上海市重点学科规划项目

明代唐诗接受史

查清华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 guji@guji.com.cn

(3)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

开本 650×980 1/16 印张 21.125 字数 333,000

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,800

ISBN 7-5325-4501-6

I·1886 定价: 35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64084137

责任编辑/黄亚卓

封面设计/天艺坊

序

陈伯海

欣喜地看到清华这本《明代唐诗接受史》书稿终于问世，我实已等待多时了。记得还是在九年前，清华随我攻读博士学位，不久便选定明代诗学为主攻方向。三年后写出学位论文《明代格调论诗学研究》，在答辩会上颇得一些专家学者的好评，希望他继续努力，加工成专著出版。我也催着他早日将成品拿出来，可他总是说：“还需要多看点材料，多作些思考。”一晃眼四五年过去，书稿仍不见踪影，不过我知道他并未闲着。这期间他承担了我所主持的《唐诗学史稿》明代部分的撰写，又在各种刊物上陆续发表专论多篇，就所述及的范围而言，较之原先的博士论文确实显得更充实也更深入，这当然是在为书稿做准备的。终于到了去年秋天，眼看着和他同时甚或晚几年毕业的博士们，一个个将学位论文变成专著，他似乎也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发誓说：“明年一定交出答卷来。”于是才有了眼前三十多万字的著作。

为什么清华要对这本书稿倾注如许心力呢？除了他惯常持有的锲而不舍的人生态度外，主要是因为他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。唐诗作为我们民族艺术文化宝库里的瑰宝，是入所皆知的；它在民族诗歌传承中呈现出独特的风采，后世有所谓“唐音”与“宋调”之辨，亦已成为耳熟能详的历史公案。但将历代的唐诗研究视为一门学问——唐诗接受学（或曰唐诗学），且将其发展、演化的脉络梳理成唐诗的接受史（唐诗学史），则还属于晚近兴起的新的学术生长点，是大有可为的待开发领域。而在这个领域中，明代的唐诗接受无疑占据着十分显要的位置。明入“举世宗唐”的诗学风气，不仅推动着唐诗的接受活动向着普泛的对象和多样化的形

态展开,更在诗学观念的提炼和诗歌体式的辨析上,达到相当精深而细微的地步。可以说,唐诗学之成为一门学问,是在明人手里才得以真正实现的,而整个中国诗学理论与实践的建设亦由此而上了一个台阶。

明乎此,当不难理解作者何以要在这个题目上化大力气了。就呈现在眼前的著作而言,它确实做到了对明代唐诗接受史的系统清理和总结,不仅揭示了接受活动所由发生的历史环境,勾画出其三大段六小段的基本进程,还对各个时期、各家各派的唐诗接受观念与方法加以细致的比较分析,对各种接受形态亦均有具体而翔实的考察,其中含有不少作者独到的发现与思考。我尤其欣赏书中有关明代唐诗文献学的认真发掘与重点阐说,这类涉及选诗、编集、汇刻、圈点、评注、考释等多样形式的接受活动,原是我国古典诗学传统里的一大宗遗产,关联到许多方面的文化现象和审美情趣,但由于零散而不成体系,每每为当今论者所忽略。本书所下的工夫虽尚是初步的,却也能为今后的诗学研究提供范例。

当然,学问永无止境,清华自己也未必以既有的成果为满足。他曾对我说:“明代诗学特别是格调论诗学,理论上还大有可深入的余地,文章并未做足。”我以为,这样的说法是符合认识规律的。在写成这本著作之后,或许他会有进一步的考虑,要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探索,不断奋进,我热切地期望着。

2006年6月于圣荷西客地

序 / 1	陈伯海
第一章 概说 / 1	
第一节 明代唐诗接受的社会文化背景 / 2	
第二节 明代唐诗接受历程 / 9	
第三节 明代宗唐诗学的主流与别派 / 13	
第二章 洪武至永乐:复古思潮中的唐诗接受 / 18	
第一节 浙籍诗人的崇唐倾向 / 18	
第二节 吴中诗人对唐诗的审美取向 / 28	
第三节 闽中诗派与高棅选唐诗 / 35	
第三章 洪熙至成化:理学思潮中的唐诗接受 / 54	
第一节 理学视角下的唐诗价值 / 54	
第二节 从台阁诗人到李东阳 / 60	
第四章 弘治至嘉靖中叶:格调论唐诗学的兴盛与低落 / 68	
第一节 前七子的唐诗接受 / 68	
第二节 七子同调的唐诗观 / 82	
第三节 其他各别派之唐诗观 / 92	
第五章 嘉靖中叶至隆庆:格调论唐诗学的复兴与改良 / 108	
第一节 后七子对格调论唐诗观的弘扬 / 108	

第二节 后七子对前七子的修正与超越 / 119

第三节 明代唐诗接受的几个争议焦点 / 134

第六章 万历:性灵论主潮下的唐诗接受 / 172

第一节 性灵论的崛起与唐诗接受 / 172

第二节 格调论唐诗学的深化 / 196

第三节 道学家的唐诗观 / 229

第七章 天启至崇祯:唐诗接受的多元走向 / 236

第一节 格调论唐诗学的蜕变 / 236

第二节 唐诗观由格调走向神韵 / 258

第三节 经世思潮下的唐诗接受 / 268

第八章 明代唐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/ 278

第一节 明前期唐诗的重刊、选编与评注 / 278

第二节 明中期唐诗的重刊、汇刻、选编与评点 / 284

第三节 明后期唐诗的汇刻、选编与评注 / 296

参考书目 / 319

后记 / 331

第一章 概 说

明代文坛复古思潮和主情思潮盛行，二者都将审美理想指向唐人。明人对唐诗膜拜的程度，没有哪一个时代可与相提并论。明人的诗歌创作活动大体都和唐诗接受有关，他们旗帜鲜明地以唐诗为范式，又以拟似唐诗为归趋。明人自己就是这样描绘当代的诗歌史：“明洪、永之际，律得唐之中；成化以前，律得唐之晚；弘、正之际，律得唐中盛之间；嘉、隆之际，律得唐初盛之间。”^①他们习惯于将本朝诗与唐诗对应论列：

以唐人与明并论，唐有王、杨、卢、骆，明则高、杨、张、徐；唐有工部、青莲，明则弇州、北郡；唐有摩诘、浩然、少伯、李颀、岑参，明则仲默、昌谷、于鳞、明卿、敬美，才力悉敌。惟宣、成际无陈、杜、沈、宋比，而弘、正、嘉、隆羽翼特广，亦盛唐所无也。

唐歌行，如青莲、工部；五言律、排律，如子美、摩诘；七言律，如杜甫、王维、李颀；五言绝，如右丞、供奉；七言绝，如太白、龙标；皆千秋绝技。明则北郡、弇州之歌行，仲默、明卿之五言律，信阳、历下、吴郡、武昌之七言律，元美之五言排律、五言绝，于鳞之七言绝，可谓异代同工。^②

即使以反复古为号召的性灵论者，也只是接受唐诗的角度、方式和范型有别。为此，明人就唐诗进行辑佚、校勘、选编、笺注、辨伪和刊刻发行方面，做了大量工作。在目前可考知的 600 种唐诗选本中，明代有 181 部，占

① 李维桢《皇明律范序》，《大泌山房集》卷九，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。

② 胡应麟《诗薮》续编卷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排印本。

30%，尚不包括与其他各朝合选的本子^①；《四部丛刊》诸编共收录唐人别集74部，明刊、明抄即占39部；仅此两项便可凸显明人整理和传播唐诗的功绩。因此，考察明代唐诗接受史，当考察明代有关唐诗的选本、编集、注释、考证、圈点、说解、论述、习作等各种形态，描述明代接受唐诗的总体进程，总结明人接受唐诗的丰硕成果与经验教训。并由此反观明人的审美观念、精神状态、思维方式、生活阅历和文化背景众多方面，进而从一个侧面揭示明代社会心理和文化思想变迁的轨迹。

第一节 明代唐诗接受的社会文化背景

唐、宋、金、元的丰厚积累，为明代唐诗学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；元人开启由宋返唐的通道，使宗唐余绪直达明初。明代特定的社会政治、士人心态、经济状况与文化条件，共同影响着明人的唐诗接受。

一、前朝积累与宗唐启迪

唐诗接受的历史从唐代就已开始。唐代诗人在从事诗歌创作的同时，就一直积极思考诗歌观念的构建和表现形式的创新，他们往往通过选诗、品藻、纪事和论说等方式，对当代诗歌进行批评与研究。

就唐人选唐诗而言，陈尚君先生考及一百三十七种，另存目五十余种^②，数量已属可观。这些选本至明代虽大多亡佚，但数量肯定远胜于今天所见^③。像芮挺章《国秀集》、殷璠《河岳英灵集》、元结《箧中集》、高仲武《中兴间气集》、姚合《极玄集》等均见多次重刊。虽然选诗的实践早在整理《诗经》时即已开始，但选、评结合的体例尚属唐人独创，如《河岳英灵集》，集前有叙和集论各一篇，概述编选宗旨和诗歌发展源流，集中诗人名下附有评语，概括其艺术风貌，间涉生平事迹。另如顾陶《唐诗类选》、韦庄《又玄集》、韦穀《才调集》等，以通识的眼光对唐诗作整体观照。除

^① 参见孙琴安《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》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。

^② 陈尚君《唐代文学丛考·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。

^③ 参本书第八章《明代唐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》。

此之外,还有数量可观的唐人别集^①,保存了大量诗歌作品。这些总集或别集虽然只有少数流传到明代,但他们不仅成为明人的读本,且其编纂形式以及其中所体现的诗学观念,特别是通过选诗建构诗学范型的努力,也启发了明人对唐诗文献的整理、开发与利用。

在理论观念上,从唐太宗及其群臣对六朝诗风的反思开始^②,陈子昂标举“兴寄”与“风骨”,倡“音情顿挫,光英朗练,有金石声”^③;王昌龄论“调声”与文意,倡格高与调稳^④;李白赞“文质相炳焕”,斥“雕虫丧天真”^⑤;殷璠论“神来、气来、情来”,从“审鉴诸体,委详所来”中定优劣论取舍^⑥;杜甫对初唐四杰、陈子昂、李白、高适、岑参等人的品藻^⑦,元稹的李、杜优劣论^⑧,白居易“裨补时政”的讽喻说^⑨,皎然论“辨体”与“五格”^⑩,孟棻对诗歌背景材料的发明^⑪,司空图对唐诗发展史的归纳^⑫,皮日休对唐诗体裁的溯源辨流^⑬,张为对唐诗风格的分门别派^⑭,以及自初至晚大量

① 陶敏、李一飞《隋唐五代文学史科学》:“今知有别集的唐代作家达到900余人,集983部,加上五代十国别集,约有1100部。”中华书局2001年版,第9页。

② 参唐太宗《帝京篇序》(《御定全唐诗》卷一)、令狐德棻《周书·王褒庾信传论》、魏徵《隋书·文学传序》等。

③ 陈子昂《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》,《陈伯玉文集》卷一,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
④ 张伯伟《全唐五代诗格汇考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,第172页。关于王昌龄《诗格》内容之真伪,参张著第147页。

⑤ 李白《古风》其一、其三十五,瞿蜕园、朱金城《李太白集校注》卷二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。

⑥ 殷璠《河岳英灵集序》,《河岳英灵集》卷首,《唐人选唐诗(十种)》本,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。

⑦ 见杜甫《戏为六绝句》、《陈拾遗故宅》、《春日忆李白》、《奉简高三十五使君》等诗,彭定求等《御定全唐诗》卷二二七、卷二二〇、卷二二六,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⑧ 元稹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》,《元稹集》卷五六,中华书局1982年冀勤点校本。

⑨ 白居易《与元九书》,《白氏长庆集》卷四五,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刊本。

⑩ 参皎然《诗式》。拙作《皎然与司空图美学思想辨异》(载《江海学刊》1990年第6期)论之较详。

⑪ 孟棻《本事诗》,丁福保辑《历代诗话续编》上册,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

⑫ 司空图《与王驾评诗书》,《司空表圣文集》卷一,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
⑬ 皮日休《松陵集序》,《皮子文藪》卷一〇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萧涤非、郑笃庆整理本。

⑭ 见张为《诗人主客图序》(《全唐文》卷八一七)及其《诗人主客图》(丁福保辑《历代诗话续编》上册)。

的诗格研究著作,都在明人的接受中得以复活,成为明代唐诗学的理论基础。

宋人作诗也在唐诗中寻找范式,宋初所谓白体、晚唐体、西昆体诗人直接规模唐人,欧阳修以中唐为宗,苏轼取法李白和白居易,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以杜为祖,等等,他们在创作实践中接受唐诗的经验和教训,成为明代唐诗学的宝贵财富。

宋人学唐诗的热潮,在崇文尊儒、科技明显进步的文化条件下,也促进了唐诗文献的整理和开发。总集如北宋时李昉、徐铉等修撰的大型诗文合刊《文苑英华》,汇存了相当丰富的唐人诗歌资料;姚铉《唐文粹》录诗九卷,专宗古体;王安石《唐百家诗》二十卷,选录一百零四家诗一千二百四十六首。南宋时赵孟奎辑《分门纂类唐歌诗》一百卷,收一千三百五十三家诗四万零七百五十一首;郭茂倩汇编《乐府诗集》,半数以上为唐人乐府诗;洪迈《万首唐人绝句》则集唐人绝句大成。选本如赵师秀《众妙集》、《二妙集》、周弼《三体唐诗》以及金人元好问《唐诗鼓吹》等,均各有宗趣。此外,宋人整理唐人别集尤见成效,重编、校勘、辑佚、编年、注释,整理了大量唐人诗集,以杜甫、韩愈别集的整理成果最著,甚至出现“千家注杜”、“五百家注韩”的盛况。宋人整理的唐诗文献流传至明成为珍贵遗产。不仅如此,宋人在整理唐诗文献时还创造了新的批评形态。如将诸家相关注释汇集于同一诗集,编成“集注”本,南宋刻本《分门集注杜工部诗》,即汇集王洙、赵次公等一百四十九家注释;郭知达《九家集注杜诗》汇集王安石、宋祁等九人注文;更有所谓《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》者。又如将接受者的感受融进对作品的阐释,形成“评点”本,刘辰翁曾评点孟浩然、王维、李白、杜甫、韦应物、李贺等人诗集,明天启年间刻有《刘须溪评点九种》印行。宋人创造的这些批评形态,在明人那里得以继承并发扬。而计有功所撰《唐诗纪事》收录一千一百五十位诗人的作品及有关事迹与评论,为现存最早的唐诗研究专著,也是明人研究唐诗取资的对象。

从理论观念上说,宋人在序跋、书信、论诗诗等传统批评形式外,增加了诗话这一灵活的形式,促使唐诗评论与研究更为发达,使得宋人在唐诗研究方面创下新的业绩。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、苏轼《东坡诗话》、陈师道《后山诗话》、魏泰《临汉隐居诗话》、叶梦得《石林诗话》、吴可《藏海诗话》、张戒《岁寒堂诗话》、刘克庄《后村诗话》为其中较突出者。不过总体

而言,宋人的唐诗观对明代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二:一是以程、朱为代表的道统唐诗观,二是严羽的诗学。程颐以狭隘的功利意识否定唐诗的价值,这一观念在明代道学家的论说中不绝如缕;朱熹对唐诗的研究虽多中肯綮,但从心性涵养的角度对平淡一格情有独钟,这在明代理学家中也得以传承。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对唐诗的特点、分期、地位等重大问题的总结和归纳,特别是他所确立的宗唐范式,在明代主流诗学中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在唐诗接受史上,元代出现两部重要著作:《唐音》和《唐才子传》。杨士弘《唐音》把严羽的理论初步贯彻到选诗的实践中,成为第一个以盛唐为宗的选本,直接影响到高棅选唐诗,这也是明前期百余年间流传最广、声誉最高的唐诗选本;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为唐代诗人传略,涉及近四百位诗人,汇集许多唐人传记和文学资料,为唐代诗歌史勾画出初步轮廓,在明人的唐诗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不过,更为直接地开启明人宗唐风气的,是元代诗坛的创作倾向。元人在对宋金诗学流弊的反思中,确立了弃宋归唐的路子,这在戴表元、袁桷、杨载、虞集、杨维桢、戴良等人的诗歌创作中表现最为明显,他们接受唐诗的热情和方式,径为明人承继。

二、社会政治与士人心态

公元1368年,朱元璋率军攻下元大都,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元朝宣告结束,汉族人从异族手中夺回了政权。洪武元年《实录》说:“初,元世祖自朔漠起,尽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……上久厌之,至是悉令复旧。衣冠一如唐制。”“复旧”,也就是恢复汉族文化传统。朱元璋要求衣冠如唐制,体现了他对唐人精神风貌的怀恋和憧憬。他指责元代“废坏纲常”^①,要求天下“讲论圣道,使人日渐月化,以复先王之旧,以革污染之习”^②。这种复兴“古道”的权威导引,在民族心态的作用下,深得汉族士人感情上的认同。摆脱了异族人的统治,他们扬眉吐气,振兴汉族文化的历史责任感使他们在前朝历史中寻找已逝的辉煌,明初的大批儒者,如宋濂、刘

①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二六,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据原北图红格本校印本。

②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四六。

基、王祿、胡翰等，就像建文時的方孝孺一樣，均有志於“駕軼漢、唐，銳復三代”^①。從皇帝到士人，都視復古為強國興邦的有效途徑，都把前朝盛世如漢如唐看作自己的奮鬥目標。其時弥漫的復古思潮，很大程度上是這種民族心態的显现。這一復古思潮一發而不可收，成為有明一代的主流思潮，為宗唐詩學的興盛提供了空前契機。

劉基《蘇平仲文集序》曾說：“今我國家之興，玉宇之大，上軼漢唐與宋，而盡有元之幅員，夫何高文宏辭，未之多见，良由混一之未遠也。”“遠”到一百三十年後，“高文宏辭”的追求終於變成現實：“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。”^②這得歸功於明孝宗，他無意中給宗唐詩學的興盛提供了一次歷史性機遇。

弘治即位後，整飭吏治，任用正臣，廣開言路，尊重內閣，革除前朝弊端，全面推行新政，在位十八年間，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文化諸方面欣欣向榮，史家多稱“弘治中興”。李夢陽曾描述：“是時國家承平百三十年余矣。治體寬裕，生養繁殖，斧斤窮於深谷，馬牛遍滿阡陌。即閭閻而賤視綺羅，梁肉糜爛之，可謂極治。然是時海內無盜賊干戈之警，百官委蛇於公朝，人則振佩，出則鳴珂，進退理亂弗嬰於心。蓋暇則酒食會聚，討訂文史，朋講群咏，深鉅賸剖，乃咸得大肆力於弘學。於乎，亦極矣！”^③弘治待人寬厚，是明朝唯一不施“廷杖”的皇帝，也是少數幾個未實行過“文字獄”的皇帝之一。這使得從明初以來一直備受壓制的士人終於挺起腰杆，鼓足信心和勇氣，他們積極進取，希望再創漢、唐盛世。前七子都是弘治進士，他們高唱“文必秦漢，詩必盛唐”，摹擬漢、唐的高格逸調，正是這種理想心態的體現。“詩必盛唐”的倡揚，產生的影響廣泛而深遠，古典唐詩學真正進入了興盛期。此後的復古派成員也抱有這一理想信念，如王世懋稱“三代以後，漢、唐為盛”，面明又勝過漢、唐^④。直至胡應麟，他在論中國詩歌的發展盛況時，將漢、唐與明代相提並論：“自《三百篇》以迄於今，詩歌之道，無慮三變：一盛於漢，再盛於唐，又再盛於明。”^⑤李維楨

① 永瑤等撰《四庫全書總目·〈遜志齋集〉提要》，中華書局1965年版。

② 張廷玉等撰《明史·文苑傳》，中華書局1974年點校本。

③ 李夢陽《熊士選詩序》，《空同集》卷五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
④ 王世懋《窺天外乘》，《鳳洲雜編》二附，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。

⑤ 胡應麟《詩薮》續編卷二。

则自豪地宣称：“所贵乎明者，谓其盛于唐，而久于唐也。”^①在他们的心灵深处，只有汉、唐，才可与大明相提并论；只有明代才能追步并超越汉、唐。

除上述民族心态和士人的理想心态外，士人的逆反心态也是明代宗唐诗学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。明初以来，政治上强化君权，削弱臣权，对知识分子采取高压政策，士大夫特别是普通士子社会地位很低。为了在思想领域推行专制政策，朱元璋即大力提倡程朱理学，朱棣上台后，继续加强文化钳制，限制士人思想自由，先后颁行《五经大全》、《四书大全》、《性理大全》。一时间，“世之治举业者，以《四书》为先务”；言《诗》，“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”；言《礼》，“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”^②。程朱理学成为人世间的绝对真理，成为士人的精神规范和行为法则。黄佐《眉轩存稿序》说：“成化以前，道术尚一，而天下无异习。学士大夫视周、程、朱子之说如四体然，惟恐伤之。以故词虽往往弗华，而每根于理质。”借复古的时代思潮，否定不合理的现状，既是一种需要，也是一种机智。明人对“主理”的宋诗的厌恶，对“主情”的唐诗的推崇，曲折地反映了他们对现存秩序及其思想专制的不满，正是他们叛逆心态的体现。为此，他们喊出“诗必盛唐”的口号，将求真的理想、主情的目标寄托于“风人之诗”汉魏、盛唐诗，从而导致宗唐诗学走向繁荣。万历后性灵派对盛唐权威加以质疑，却进而解放了中晚唐诗，使得明人的唐诗接受更为全面，其逆反心态也体现得更为鲜明。

三、经济状况与文化条件

从朱元璋开始，明代君主就非常重视人才培养。明代的办学规模远超前朝庞大，官学如太学、各州府县学遍布全国，大多读书人从读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开始，就为日后进入官学作准备，以便通过科举求取功名。弘治以后，农业得以恢复，手工业日益发达，商业经济逐步繁荣，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条件。教育的相对普及，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的规范化，大大提高了明人的整体文化素养，仅《明史·艺文志》记载，明人的诗文别集达1188部，近两万卷。整体文化素养的提高，使得明代读者群空

① 李维桢《皇明律范序》，《大泌山房集》卷九。

② 朱彝尊《道传录序》，《曝书亭集》卷三五，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前壮大。已入仕的文人视书籍为雅品,如王士禛《居易录》卷七所记:“明时,翰林官初上,或奉使回,例以书籍送署中书库。……又如御史巡盐茶、学政、部郎推关等差,率出俸钱刊书。今亦罕见。”不少商人附庸风雅,与文人士子往来唱和,特别是明中后期文人圈中,一些未入仕途的平民文人人数众多,相当活跃,加上不断壮大的普通市民阶层对文化充满需求,成为唐诗在明代得以广泛传播的人文基础。

读者群的壮大,为刻书业提供了广阔市场。便于速成的活字印书始创于宋、元,但没有流传开,至明代,铅活字、铜活字的采用,使印刷技术得以改进,成为刻书业的技术保证;经济实力更是刻书业发达的物质前提。陆容《菽园杂记》卷十二载:“洪武年间,国子监生课簿仿书,按月送礼部,仿书发光禄寺包面,课簿送法司背面起稿,惜费如此。永乐、宣德间,鳌山烟火之费,亦兼用故纸,后来则不复然矣。成化间,流星、爆杖等作,一切取榜纸为之,其费可胜计哉?”明中叶后,中央及地方官府、藩王府都有规模很大的刻书机构,民间书肆更是通布全国,仅福建建宁一地就有书坊60家^①。叶德辉曾记载明人刻书风尚:“数十年读书人,能中一榜,必有一部刻稿。屠沽小儿,身衣保暖,歿时必有一片墓志铭。”^②周弘祖《古今书刻》上编记载,隆庆三年(1569)以前明代所刻书约有2500种。印刷技术的改进,刻书业的发达,为唐人诗集的纷纷面世提供了便利的客观条件,以致出现了像《唐五十家诗集》、《唐百家诗》这样大型的汇刻以及《唐诗纪》、《唐诗类苑》、《四唐汇诗》、《唐音统签》之类集成性总集。

有明一代,文学集团林立,流派纷呈,据郭绍虞先生统计有176个。诗人结社成风,明代初年,就有北郭社、南园社、闽中十子社、凤台诗社等,弘治、正德年间,又新结诗社近10个,嘉靖年间,各种新社或老社重组,则有近20个^③。入仕的文人参与朝廷和地方政治,结社有助于凝聚力量,扩大影响。求学与应试的经历,使他们非常看重同乡、同门、同年及师友关系,从而形成某种派系。无论是趣味相投的诗社还是以情谊维持的派系,周围都有多人簇拥。这种集团性和规模性,有助于某种文学主张迅速传播,形成气候,扩大影响。前后七子倡导的一整套格调论唐诗观,之所以

① 张秀民《明代南京的印书》,《文物》1980年第11期。

② 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卷七,中华书局1957年版。

③ 郭绍虞《明代的人文集团》,《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。